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1999年即將來臨，這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年頭。明年本刊各個專欄將陸續刊登有關回顧二十世紀並展望下一個世紀的文章，歡迎讀者根據各專欄的特點結合自己的專業給本刊寫稿，字數在八千字以內。

——編者

回應馮耀明先生

馮耀明君在《二十一世紀》第四十八期(1998年8月號)有一篇文章：〈德古來(外星人)的新儒家世界：一個思想實驗〉，造了一個寓言，對於王陽明、熊十力一路的思想極盡嘲諷之能事。然而，陽明、十力的比喻之不足以證成其說，正好像馮耀明君的寓言之不足以摧毀其說一樣。由於馮君的重點是放在邏輯的一致性與經驗的融貫性，注意力集中在「內在」的層面而不在「超越」的層面，故此接觸不到宗教信仰最核心的問題。這恰正是我在〈論宗教的超越與內在〉一文(編按：參本期)第三節中所要說明的道理。馮耀明君的外星人比喻看似新鮮，其實觸及的都是些老問題。美國曾有一系列人猿統治地球的電影，把人放在動物園裏做觀察實驗，與

馮君的設想若合符節，何必遠求到外星去。馮君認為宇宙論的玄想與道德倫理的實踐之間，應該有清楚的分界線，的確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但孔孟思想之中，是否一定沒有「天人合一」理念的種子呢？要講「天人合一」，是否一定要像馮君所設定的陽明、十力那樣的講法呢？即使像馮君那樣接受「義、命分立」的原則(事實上沒有儒家會否定這樣的原則)，是否一定得排拒所有宇宙論的玄想呢？不錯，這個領域之內的确是缺乏精確的知識，但是否就完全沒有探索的價值呢？至少羅素是肯定這樣的探索的，他明白反對邏輯實證論的狹隘的觀點。當前則流行反對過份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宇宙論在西方哲學似有復蘇之勢；環保意識也促進一種把人重新放回到宇宙之內來考慮的「天人合一」(anthropocosmic)的思考模式。再以近事為例，香港為了禽流感事件殺了數以百萬的雞，據報美國方面的評估謂，這樣做可能避免了瘟疫流行的浩劫。有人會贊許這樣做，但這樣的人是否一定會排拒「太和」的理念或信仰呢？只怕未必。馮君是有他自己的一條思路，此無傷；但宗教哲學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問題，恐怕不是他的分析所可以

範圍的，還值得我們好好作進一步的反省與探索。

劉述先 香港

98.10.9

「天人合一」與「世界大同」不合時宜？

馮耀明在《二十一世紀》發表〈德古來(外星人)的新儒家世界：一個思想實驗〉(1998年8月號)，強調新儒家「天人合一」說與先秦儒學人禽之辨絕不相容，因為前者是超歷史的宇宙化之道德，後者則為依附社會歷史處境的人間性之道德。唐君毅先生嚮往仁心和天心感通，達爾文警告我們：「處處都在鬥爭，自然實遍地血腥；千萬不要以為鳥在唱、獸在舞，……他們實只在緊張地爭生存。」儒家肯定屠殺禽獸合理，然而外星人亦可憑較高的進化程度，斷定宰殺地球人合理。一般人反對讓植物人「安樂死」，甚至貶為謀殺，不知存活的高等動物比植物人高貴呢！儒家堅持仁愛的差等性，但是「天人合一」觀必須取消差等觀，否則仁者豈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馮氏執持「天人合一」的嚴謹涵義：人和大自然徹底協調無衝突，如人不必屠宰禽獸、動物不必侵害人類，即《禮記·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遺憾的是，萬物既並育且相害，恰似《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應當修正為「道並行(多元論)且難免相悖」。俗陋之儒食古不化，倘若仍抱嚴

義「天人合一」、蒙昧於狡詐殘酷的生存競爭以及動物界的苦樂與需求，就陷溺於幼稚滑稽、一廂情願、自覺良好的幻想境界。「世界大同」亦具嚴寬兩義，《禮記·禮運》作者不知世界愈複雜則人心愈險惡，遂倡寬鬆義的「大順」或「大同」，確實可能實現於一個國家。但是嚴義「大同」必須消泯全球種族、宗教、風俗及意識形態的衝突，我認為這不大可能。蘇東坡被愛妾王朝雲譏笑為「滿肚子不合時宜」，嚴格的「天人合一」與「世界大同」最不合時宜，改善環保、愛護生物、開放思想、豁達胸襟談何容易啊！

王煜 香港

98.10

了解與不了解

拙文〈語言的殖民地〉(見《二十一世紀》，第四十七期)只是將毛丹青的觀點略作引伸並提出一點個人看法，沒想到卻使「《東西方漢學學術史》和《漢學通史》的作者」京都靜源「費解」。自知「費解」是一種並不愉快的感覺，所以這裏說聲「抱歉」並作幾點解釋，以便京都靜源早日走出「費解」。第一，本人的觀點與毛氏的觀點同多於異，談不上「反駁」。而且，本人的反對「文化諂媚」與京都靜源的批評「文化漢奸」亦有精神上的相通。第二，拙文是就毛丹青的文章談及的「中國人在日本大唱中國戲」這一問題發議論，京都靜源的「我們所批判的在日中國學者的大唱中國戲的現象，完全是指那

種以日文著述來幫助日本政府 and 學術界研究和分析中國的政治、經濟方面現實的中國狀況的現象」是從何說起？我並不知道京都靜源也曾批判過「在日中國人大唱中國戲」，而且，雖然京都氏是「《東西方漢學學術史》和《漢學通史》的作者」，我知道這個名字卻是由於讀了在東京創刊不久的《新華僑》雜誌。第三，我雖然沒曾寫過《東西方漢學學術史》和《漢學通史》(也不敢寫)，發言權還是應當有的。因為我至少認真讀過野村浩一的書。如果京都氏冷靜地讀一遍野村氏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應當能夠明白究竟是誰在「廉價的使用語言」。第四，我不認為京都靜源可以代表「日本絕大多數人」。中國人與日本人究竟互相了解到何種程度，只研究「東西方漢學學術史」是不夠的，還應研究一下「中國日本學史」和「近代中國人的日本觀」。其實，日本人如果真的要那麼了解中國，中國人是很難在日本「大唱中國戲」的。

最後說一句，異國、異文化之間的互相「了解」是好事而決非壞事。「了解」是「共生」的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為了幫助日本全面、正確地了解中國(同時也是為了全面、正確地了解自己)，中國人在日本唱中國戲是有必要的。

董炳月 東京

98.9

守住自由經濟、自由社會和市民自律的傳統

貴刊8月號張辰龍的〈一國兩制與香港的憲政民主〉抓住

了香港發展的核心問題：如何使全世界聞名的香港自由制度化、憲政化，而不是僅僅靠中央政府50年不變的許諾。香港回歸一年多，以我不久前訪問香港期間的觀察，有三個問題：(一)社會秩序開始與大陸「接軌」。地鐵中的未下先上，街上行人公然亂穿紅燈，令我這個「表叔」也歎為觀止！社會秩序的無序化預示着市民社會自律性的減弱，而後者恰恰是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二)文官制度的效率開始發生問題。新機場的混亂是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證。港報後來披露，之所以如此混亂，乃是因為機場監管局的官員們也學了政治掛帥，整天開會研究如何安排出席盛典的嘉賓，無暇顧及新機場的技術問題！香港曾經以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文官制度而自豪，但一年的變化表明：文官制度的合理性不是自洽的，它必須有一個同樣理性的、合理的政治制度作為基礎，但香港目前顯然還沒有建成這樣的政治體制。(三)港府在金融危機中大規模地干預市場經濟。香港的自由經濟過去之所以受到世界歡迎，乃因統治香港的是一個全世界最無為的、有限的政府。如今港府「大有作為」，實在令人懷疑自由的根基是否發生了動搖。從這些變化可以看到，一個缺乏制度化、憲政化保障的自由其實是很脆弱的，要落實港人治港，首先要有一個合理的、理性的和分權的憲政民主制度。要實現這一點，起碼要守住過去已有的自由經濟、自由社會和市民自律的傳統，否則只會離目標越來越遠！

曾經 上海

98.9.8